

書 評

汪 榮 祖*

Huaiyin Li（李懷印）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xii+388 pages. ISBN 978-082-4836-085

這本書的主題為「重新發明現代中國」（Reinventing Modern China），唯不知作者李懷印只是用一個時髦的字「重新發明」（reinventing），還是真要以「後現代」的概念來論述「中國的歷史書寫」（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如屬於後者，那中國的歷史書寫只有「想像」（imagination），何來「真實」（authenticity）？因「後現代」以「發明」來取代現代史學所重視的「發現」，就是認為真實發生過的歷史隨風而逝，不可復得，所有的歷史都是史家的「發明」，甚至認為歷史家寫歷史無異於文學家寫小說。通閱全書，作者不時喜用一些「後現代」的名詞，但並沒有真用後現代理論來寫中國現代史的史學史。有鑑於作者不屑「極端革命史學」之扭曲史實，必然是相信有客觀而能夠信賴的歷史。作者在立論上徘徊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難免令讀者有不一致的感覺。

2013 年 5 月 14 日收稿，2013 年 8 月 9 日修訂完成，2013 年 8 月 1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暨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Wong Young-tsu is a chair professor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此書主要的內容是近代中國歷史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書寫，涵蓋的時間主要是二十世紀，各章節分別為近代化敘事的開始：1949 年以前的「民族主義史學」，革命敘事的開始：1949 年以前的「馬克思史學」，1950 年代馬克思「新正統史學」之形成，毛澤東發動的「極端史學」，1980 年代挑戰革命正統的「新啓蒙史學」，以及改革開放時代史學典範的轉移。從這些章節可知，所謂「重新發明」近代中國的歷史書寫，僅限於中國大陸，幾乎完全排除包括港臺在內廣大的華文世界，使讀者看到書名後的預期有些落差。即使僅涵蓋大陸地區，百年之中史家之衆、著作之多、議題之繁，也難免不掛一漏萬，有考慮未周之處。謹就管見所及，略作評論，未必有當，謹就教於作者與讀者。

梁啓超在二十世紀之初，提倡「新史學」，號稱史學革命，視傳統史學爲「帝王家譜」而否定之，欲代之以西方盛行的「國史」(national history)，而民族主義乃民族國家的意識型態，西方列強也有其民族主義，且形之於史學書寫，西洋史學史稱之爲「民族主義影響下的史學」，而不稱「民族主義史學」。近代中國受到列強侵略，「近代民族主義」自更高漲，然作者並未專注於民族主義如何影響歷史書寫，卻花了許多篇幅旁及 1930 年代主流知識分子拋棄民主自由而傾向專制獨裁國家（頁 38），引用了不少自由派人士的政論文字，主張對內獨裁，支持南京政府，對外親善等言論（頁 60-71）。如果當時的民主與獨裁之爭與歷史書寫沒有直接的關係，豈不偏離了「歷史書寫」的主題，不免令讀者有節外生枝之感。

作者既不深探 1949 年前民族主義如何影響史學，而視此一時期爲「近代化敘事的開端」。所謂近代化的本質就是西化，西方國家最先近代化，成爲非西方國家近代化的模式。非西方國家有其自身的文化，雖採用西方模式，其結果未必與西化同，故稱之爲近代化，實優於西化。然作者認爲「從西化轉變爲近代化，反映知識分子愈來愈感覺到視西方文化或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爲非西方國家致富強唯一模式的謬誤」（頁 42）。非西方國家在二十世紀既尚未近代化或充分近代化，除了唯一的西方模式外，似無別的模式可言。更費解的是，作者認爲「1930-40 年代中國近代化論者的理念，與 1950-60 年代以美國爲主的近代化理論極爲相似，因三、四十年代主張近代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在美國受教育，因而他們得以分享西方的近代化理論」

(頁 42-43)。按 1950-60 年代的近代化理論產生於二戰後之西方，特別是美國，乃有鑑於殖民地時代終結後，亞、非、拉新興國家蜂起，學者們爭相為之設計近代化理論。近代化理論實有豐富的內涵，而 1930-4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謂近代化多從字面理解，認為傳統是近代化的阻力，希望中國排除阻力而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之路，迎頭趕上西方國家，與 1950-60 年代近代化理論並不相似，近代化理論並不認為傳統是阻力；正好相反，傳統往往可以成為近代化的助力，兩者截然異趣。作者更犯了「時間錯亂」的謬誤，請問 1930-40 年代中國學者如何能夠受到 1950-60 年代近代化理論的影響？

作者所謂「近代化敘事」要點是著重中國近代史上的洋務與改革，重視科技，菁英領導等議題，而不強調帝國主義的侵略與革命運動。其實，就現代中國而言，帝國主義或革命運動無論是近代化過程中的正面或負面因素，都是無法迴避而須認真對待的重大史實。作者將「近代化敘事」與「革命敘事」分作兩種不同的「敘事」，無非要說明對歷史事件的選擇與解釋有異。然而就中國近代史的敘事而言，近代化項目與革命運動都應該是敘事的內容，不宜偏廢。作者認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幾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礎，無論在方法上或概念上創造了研究的新風格（頁 45）。然而作者只是引用一人的讚美之詞為證，卻不進一步以自己的論證告訴讀者，何以這本偏重外交史的小冊子，有這樣重大的學術貢獻。

作者認為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是眾所公認 1949 年之前最權威的教科書，其主旨是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不在外力，而是由於內部的保守、自大、腐化，所以幾乎完全不提帝國主義（頁 53、55）。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所起的作用與影響或有爭議，但其重要性之巨大卻無庸置疑。如果一部中國近代史幾乎完全不提帝國主義，則其權威性至少是相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將蔣廷黻和陳恭祿視為「近代化論述」史家的代表，但在小結中又說，蔣、陳兩人「在他們的書裡很少或全不討論中國在工業、交通、公共衛生、高等教育、政府系統、文學與藝術等方面的進步」（頁 72-73）。如果連這些近代化的要項都很少提及，或根本不提，如何能說是「近代化敘事」呢？再者，作者稱這一章為「近代化敘事的開始」，但這一開始並沒有於 1949 年終結，在港臺繼續發展的豐富內容，可惜作者未能留意，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曾有龐大的中國近代化研究計畫，也一筆不提。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馬克思史學才佔領史學陣地，在之前馬克思史學既非主流，影響也小，以專章處理，有失比例原則。作者以范文瀾爲此一時期馬克思革命史學的代表，但范氏的《中國近代史》1949 年才出版，如何能作爲 1949 年之前「馬克思革命史學的開始」？中國馬克思史學源自李大釗，而此書竟無一言及之。更可怪者，作者認爲范氏基本上是一民族主義者，而非自稱的馬克思主義者（頁 104）；又說「范氏在 1940 年代有關近代中國的著作確實是一民族主義遠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頁 108）。然則，何不把范氏放在前一章述之？事實上，這一章頗針對上一章「近代化敘事」的選題與論點，何不合而論之，可稱之爲「1949 年之前的兩派歷史敘事」？此外，爲了切題，不能僅限於敘事的內容和觀點，尙須關照敘事的方法。

作者將 1950 年代的馬克思史學視爲「新正統形成時期」（the making of a new orthodoxy），所謂「新正統」即建立根據正統馬克思學說的歷史解釋，以淡化 1930-40 年代較具彈性的革命史學。經過思想改造時期後，於 1950 年代晚期到 1960 年代中期出現了「史學的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作者指出，這一時期史學界的代表人物包括胡繩，依據蘇聯史學模式，以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爲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準則，觀察階級鬥爭在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發展。孫守任則依據毛澤東的矛盾論，以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來分期。金沖及則以「生產模式」作爲分期的準則，以檢視生產法則的發展史。最後胡繩的階級鬥爭說勝出，乃「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論述向蘇聯的馬克思主義靠攏」（頁 127），成爲中國近代史的標準解釋，且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史學的「新正統」。然而作者又指出「新正統」有其內部矛盾，中國近代史泰斗范文瀾就不認同，毛澤東對歷史的興趣以及對范之信賴也是「新正統」的致命傷，隨著現實政治的變化，「新正統」顯得愈來愈不合時宜，最後演變到劇烈的「史學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關這一段的論述，令讀者起疑的有兩端。其一，毛澤東是否真如作者所說，在百家爭鳴的政策下，在 1950 年代的初、中期，全不干預有關歷史議題的「自由論辯」（the free debate of historical issues）（頁 124）？應該指出，百家爭鳴下的百花齊放並不是要開出一百種不同的花，而是要開出一百種同樣的花，不同樣就是毒草，尙有自由辯論的空間乎？就「新正統辯論」而言，也不過是在狹

陰的馬克思框架裡的爭論，如果階級鬥爭論是教條，社會矛盾論又何嘗不是教條呢？

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作者稱之為毛澤東主持下的「史學革命」，強調「厚今薄古」、重「紅」輕「專」、「以論帶史」，以及歷史要為政治服務。作者在書中特別提到毛不僅對歷史有興趣，而且嫺熟得很，但他並非要攻擊意見不同的歷史家或具有爭議性的歷史議題，而是利用爭論來達到共識，以攻擊他真正的敵人（頁 162），也就是說，把歷史作為政治工具。然則，所謂「史學革命」何異於革史學的命？革老一輩史學專家的命？但是在這一章裡，作者也以很多的篇幅敘述被革命的「老專」如何維護「歷史主義」（historicism）以抗拒史學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北京大學的翦伯贊，作者認為翦老是六十年代初「最有影響力的學者」（頁 149）。

按「歷史主義」是西洋史學史中的一種史觀，認為任何放諸四海皆準的理性系統，皆不足以解釋不同時期與文化裡所產生的歷史，理性之外尚有特性，歷史有其特性，不能被任何通論所概括。但作者的理解並非如此，翦伯贊等也不是要反對以馬克思學說來解釋具有特性的中國歷史，而以歷史主義為不受政治干擾的、客觀性的與科學性的歷史研究，與西方人的概念並不相同。作者以英文寫作此書，一再提到 historicism，卻不加以辨明，西方讀者必然有不知所云之惑。再者，1949 年以後翦伯贊、范文瀾、郭沫若史學三大權威，並不是「資產階級」或「自由派」的「老專」，他們都是馬派史家。所以從大躍進到文革的所謂史學革命中，毛澤東利用年輕學者鬥爭老一輩學者，也不過是馬克思唯物史觀茶壺裡的風波。史學之外，當然有更多更大的風波，以致於當文革結束時，包括史學在內的學術大地一片蒼白。

文革之後，大陸學者爭相「補課」，想超越馬克思傳統，自在意中。作者認為此一新啓蒙運動不僅擺脫了毛時代，同時延續了被文革中斷的「自由傳統」（liberal tradition）（頁 171）。作者在書中另有文字討論 1949 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之中具有活力的自由主義思想，並認為翦伯贊、吳晗等都是共產黨內接受自由價值的民主派，是獨立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主要導致 1980 年代借新啓蒙運動而重生的自由主義（頁 200-203）。這段話極引人注目，但作者至少要讓讀者知道，自由主義史學如何能持續倖存於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中。1950 年代反右之後，不知自由主義者尚能餘幾？讀者不得不懷疑

作者是否領會自由主義的正解，以致於有此一說。事實上，他對「歷史主義」與「科學主義」等西方名詞也都常常是望詞生義。

文革後的新啓蒙挑戰馬克思史學正統，質疑革命敘事。作者特別提到李時岳，因其否定了自 1950 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的革命敘事，又回到蔣廷黻以及其他自由派史家的「近代化敘事」（頁 176）；但下一頁卻說李的新敘事不僅與革命敘事背道而馳，與蔣廷黻在 1930 年代的近代化敘事也相當不同，讀到第 198 頁又說「沒有太大的不同」。似乎前言不對後語。作者又說，李時岳爲了保護自己，免受正統派攻擊，向「革命建構」（revolutionary construct）作了讓步，將太平天國作爲在中國近代史的四大面向之一，但仍然對拳亂幾乎一字不提（頁 175）。這段話既說李時岳坦然挑戰正統，又說李怕正統派攻擊；以常情而論，怕熱就不必進廚房。更難以理解的是，爲了怕，才把太平天國視爲四大史實之一。太平天國史事在中國近代史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不寫，一本中國近代史如果幾乎不寫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恐怕說不過去。

更重要的是，李時岳的新敘事的性質與革命敘事未必完全不同。革命敘事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李時岳的「資本主義建構」（capitalist construct），在中國近代史裡找資本主義發展的證據，何嘗沒有政治傾向？作者自認，李時岳利用歷史爲鄧小平的改革與開放政策說話，同時用當前的政策使近代中國的近代化與西式改革合理化。作者也同意李氏的新敘事與他所挑戰的極左敘事一樣的現實，極左爲毛的政策服務，而李時岳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服務（頁 179-180）。既然如此，從史學史的觀點看，是同樣的政治干擾，在學術上何啓蒙之有？

作者稱近代史學者黎澍爲「新啓蒙思想家」（a new enlightenment thinker），因其曾大膽提出「西體中用」說，以爲中國若不接受歐美資產階級文化，只有滅亡（頁 193-194）。按「中體西用」說，雖嫌保守，仍然可行；然而「西體中用」無異全盤西化而後爲中國所用，根本不可行，因中尚未用西體，中體已經滅亡。誠如黎澍所言全盤西化後中國才能迎頭趕上近代西方（頁 198），請問迎頭趕上之後尚有中國乎？尚有中國文化乎？作者不宜順黎澍之說而不加分析與評論。

作者以真正的「典範轉移」（paradigmatic transition）來形容 1980 和

1990年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就是在選題上從動亂與革命轉移到近代化議題（頁205）。這是選題輕重的轉移，不是真正的「典範轉移」。如果作者是借用 Thomas Kuhn 的理論，所謂「典範轉移」乃指在思想上有革命性的轉移。無論革命敘述或近代化敘事，無論馬克思唯物論或近代化理論都算不上新「典範」，這種轉移在史學史上令人有不進反退的感覺。到1980與1990年代再談近代化理論，也予人有老掉牙的感覺。筆者認為值得深談的是，中國最近三十多年急速近代化的實際經驗是否足以修正，甚至推翻1950年代的近代化理論，可惜作者對此無多興趣，卻花很多篇幅去空談共產革命是否是必須或正確的近代化道路（頁220-224）；即使是不必須或不正確，那是唯一成為事實的歷史，任何其他可能的道路，隨君設想，豈不等同空想？

作者喜見「近代化敘事」最終壓倒「革命敘事」，並以胡繩從「革命敘事」撤退，證明「革命敘事」已向「近代化敘事」投降（surrender）（頁244）。既已投降，讀到其後三頁忽然又出現：「革命敘事」在中國並未衰退（頁246）。其實無論「革命敘事」或「近代化敘事」都是「大敘事」，隨著改革開放，引進許多西方當紅的歷史敘事，諸如地方史、平民史，日常生活史，重視空間更甚於時間，總稱之為社會文化史；此外，後現代史學在中國大陸也有市場。作者特別提到楊念群與趙世瑜的作品，也很明智地提到楊念群的憂慮，即中國史家將長期依賴西方理論，跳不出西方如來佛的掌心（頁254）。這是一個大問題，不僅是中國大陸，整個華文世界的史學界從梁啟超開始，一直是跟著洋人走。如何在史學上迎頭趕上，甚至超越西方，至少是應該大膽面對的特大議題。

此書大部分的內容是敘述「革命敘事」與「近代化敘事」，但在結論裡以後現代的語氣說，這兩種敘事基本上是歷史家集體想像的產品，旨在解釋以及合理化他們所想要的發展。終於見到作者對這兩大敘事都不滿意，所以希望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家們能擺脫「目的論」（teleology），去除歷史必然論；據此，並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即「在時間內」（within time）與「無預設」（open-ended）的歷史（頁267）。其意要從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來看個別史實多種可能的發展，當時人對正在發展中的事件的可能結果，未必如後來歷史家之所見，故必須從廣闊的時空背景中去解釋中國近代史。同時近代史沒有終結，仍在發展之中。「無預設」也就是要看歷史發展的多重可能

性，不能定命於唯一的歸宿；據此，共產革命的勝利亦非必然的結果。於是作者舉了許許多多歷史事件的另外可能性，例如沒有日軍入侵，中間力量不會愈來愈同情共產黨，仍然會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共產革命也就不太可能成功（頁 270）。類此假設性的問題不過是一種遊戲，著名的軍事史家 Robert Cowley 在其 *What If* 一書中曾舉出美國可能會輸掉獨立戰爭的十三種情況。然而，不論多少種失敗的可能性，都不可能撼動美國獨立戰爭與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既成事實。作者在結論裡也講了不少其他新議題，諸如中國在全球化世界的前景、立國目標，包括「和平崛起」、「偉大復興」等等，似乎已溢出歷史敘事的主題；不過，預測未來倒唯有依賴「想像」與「發明」了。不過，作者能注意到西方中心模式之值得質疑，展望多中心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國將會有自己的近代化模式，可稱有見識。

作者既然尋求新的歷史敘事，對書寫中國近代史也有自己的看法，並寄望於未來，為何不以自己的見解作為全書的主軸，逐步展開，旁及他認為有缺陷的「革命敘述」與「近代化敘事」，以及深入分析評論，而不必花太多的篇幅複述別人的述論與意見。這樣不僅主次分明，而且較能建立出自己的創見。